



新华文学 ·世华文学

黄孟文 ◎ 著

评论与

史料
选辑

云南园雅舍出版

新华文学·世华文学

评论与史料选辑

黄孟文 著

云南园雅舍 出版

新华文学·世华文学
评论与史料选辑

作者：黄孟文

编委 / 校对：毕镐娇、陈珀如、陈晞哲、李妙儒、李汶镁、
林君丽、罗健芬、聂金凤、欧阳彦德、许振群

执行编委 / 校对：陈晞哲、李汶镁

出版：云南园雅舍

Yunnan Yuan Publishing House

17, Hazel Park Terrace, #01-10

Singapore 678944

Fax no.: (65) 67664897

E-mail: meng727@singnet.com.sg

发行：〔新加坡〕云南园雅舍

〔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

国际书号 (ISBN) : 978-981-08-1244-7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定价：新币 \$14.00

马币 \$28.0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辑一 新华文学（评论）

- 6 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
- 9 新加坡文学小史——新加坡文学神州行
- 11 撰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 23 中国学者对新华文学的评论——感言
- 25 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1965-1977）
- 34 从新华文学看华人地位的变迁（1919-1989）
- 49 在文化建设声中谈“新加坡文学”
- 53 廿五年来的新华文学（1965-1990）
- 58 1990年代的新华文学
- 62 处于转捩点的新加坡华文文学
- 68 在新加坡的大环境中，如何阅读？
- 73 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发展（1919-1990）
- 84 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短篇小说（1965-1990）
- 91 略论苗秀及其作品
- 95 论连士升的散文
- 99 新华微型小说的题材——小事件与大事件
- 101 “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的发展情况
- 113 百花齐放——兼谈文学与时代、社会和个人关系
- 119 作家的责任

辑二 新华文学（史料）

- 122 新马英文小说一瞥（1965-1977）
- 132 新加坡作家协会 / 写作人协会简史
- 135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终于成立了
- 139 两年来的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写作人》副刊发刊词
- 147 响应建国文学的号召——《吾土吾民创作选》总序
- 149 拓荒的年代——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十周年纪念感言
- 151 及行迷之未远——新加坡作家协会二十五周年纪念献词
- 152 新加坡作家协会廿五年来的重要活动（1970-1995）

159	文化小虫——谈现阶段的新华文学
164	序儿童文学刊物《萤火虫》和《百灵鸟》
165	《后来》杂志的诞生
167	我与云南园
171	我的编辑经验
174	《黄孟文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自序
176	《淳于汾嵌名联廿年选粹》序
178	我的自传——《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代后记
184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后记
187	在白振华《情让生命更完美》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190	《双子话人间》序
193	《林子微型小说》序

辑三 世华文学

198	既要民族性，也要开放性——黄孟文先生访谈
202	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何时成熟——在“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的
204	“世界华文文学”释名
208	耕耘十年，果实累累——《亚洲华文作家》创刊十周年感言
210	站稳文学艺术的立场——为“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而写
212	早期新华文学与国家意识——亚洲华文作家会谈地区报告
216	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殊意义
220	两个火车头——剖析老舍的《火车》和王蒙的《春之声》
226	王蓉子的《童话城》赏析
232	序刘海涛著《叙述策略论》
233	石鸣散文《茶客》评析

附录

236	附录一：“新加坡华文文学”名称的肇始 ◎赖伯疆
237	附录二：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初期的风风雨雨（摘录） ◎田

辑 一

新华文学 (评论)

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

为了要精简地介绍新加坡的文学情况给国内和国外的有关团体／人士如国际书展、文学节、学者、评论人士等，以及强调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在积极推动文化方面的成就，该理事会连同“艺术书屋”（The Arts House）选定了约六十位各种语文作家作为代表。笔者被委任为华文文学的介绍者，同时撰写这篇文学简史。

新加坡这个小岛，自古以来，先后有过几种不同的名称，比如“淡马锡”、“狮城”、“新加坡拉”、“鱼尾狮”等，各具有不同的神话传说。

新加坡的白话华文文学，起源于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在这之前，在本地文坛上出现的，多为一般知识分子或外交使节人员所写的旧诗词或散文随笔之类，一般上文学价值不高。

由于印刷条件限制和读者人数不足，加上一些出版法令的问题，早期马华文学（涵盖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的发展主要依赖报章副刊。它们是培养华文文学的温床。杂志与单行本的出版寥寥无几。书刊一直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蓬勃发展。1977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笔者曾经联合做了一个统计：本地用华文创作的作品数目，要比所有用其他种族语文创作的数目总和还要多。

由于早期大部分的作家皆来自中国，因此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侨民意识。后来南洋色彩萌芽，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地方文艺发轫，抗日浪潮此起彼落，戏剧活动普遍发展，包括新华文学在内的“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争论，相当激烈。

此后爱国主义思想澎湃，本土文学意识高昂（注重反映“此时此地”），强调本地各民族和平共处等，甚为引人瞩目。

新加坡与马来亚 / 马来西亚原本是一家。两地居民自由往来，两地作家不分彼此。当时的“马华文学”实际上就包含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在内。新加坡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之后，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文学，历来惯称的“马华文学”便有了检讨的必要。于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便开始被使用。1970年孟毅在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总集》时，即开始使用这个名称。此后，“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成为赋予特定历史内涵的新文学，并且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建国初期，也是新华文学处境十分困难的时期，尤其是报纸副刊与其他出版物方面。它们大都出现萧条状态。这主要因为新、马两地书刊各不在对方国土发行，作品发表园地大大减少，以及出版物成本与销量成了反比。（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可喜的是：文学新秀不断涌现，写作技巧更为成熟。后来，新华文坛上还出现了几个特征：包括本国文学团体的涌现并且活跃，文学书刊（特别是专集与丛书）的大量面市，以及文学史料的整理和作家作品的研究等，成绩可观。在新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开放，新华文学以新的面貌出现，并且与其他国家 / 地区的“世界华文文学”进行了交流。富有热带风情、独具特色的新华文学，已经在世界华文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几十年来，新华文学界在创作方面至少出现了三个较为特出的现象：女性作家群涌现、微型小说兴起、作品题材非常城市化。至于文学上的思潮与创作手法，主要为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一而足，百花齐放，大家在自由民主的原则下和谐

发展。

新加坡过去被称为文化沙漠，它现在要以多元文化的形式向前迈进，以显现它的朝气蓬勃。作家一路来就由多元族群组成，作品也以多种语言书写（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本文着重介绍的是：历史悠久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学”）。

新加坡独立（1965）以后，出现了好多位重要的华文作家，包括现在已经逝世的苗秀、姚紫、连士升、杏影、威北华、林晨、力匡、郭宝琨等。

现今仍然健在而又在文学上甚有成就的（老中青），这儿要介绍十四位，他（她）们是以作家自定英文名字的字母为排列先后：谢裕民、蔡志礼、淡莹、函函、梁文福、林得楠、柯思仁、孙爱玲、陈瑞献、黄孟文、王润华、希尼尔、英培安、尤今等。选择的标准除了重视个别作家作品的质与量之外，主要依据他们曾经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仍然在积极地写作，并且积极地提高自己作品的水平。

除了上述的十四位老中青作家之外，有特别贡献的新华作家其实还有好多位，如刘思、原甸、韩玉珍、周灿、杜红、苗芒、张挥、张曦娜、南子、林方、梁钺、长瑶、刘培芳、郭永秀、蔡欣、许福吉、蔡深江、非心、陈志锐等。写长篇小说的则有田流与流军。方修在文史的整里和评论方面，贡献尤大。

新华文学尚有一些不足之处，那就是理论队伍过于薄弱，理论研究与促进作者的经验提升方面都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如何把文学的规律与特点科学化地概括出来，从理论深度上帮助作家，以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更上一层楼，那是大家所期望的。

2007年8月9日

新加坡文学小史

——新加坡文学神州行

为了促进文化交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选定了十一位作家，于2007年10月25-30日，前往中国的北京与上海访问。他们并委任笔者为共同团长，以及撰写这篇文学简史，让中国的学者读者与公众人士轻易地了解新加坡的文学。

新加坡这个小岛先后有过几种不同名称，如“淡马锡”、“狮城”、“新加坡拉”、“鱼尾狮”等。

新加坡的白话华文文学，大约起源于1919年“五四”前后。早期由于绝大部分作家都来自中国，因此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侨民意识。随后南洋色彩萌芽，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地方文艺发轫，抗日浪潮此起彼落，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文学）独特性争论，爱国主义思想澎湃，建国文学兴起等。文学上的思潮与创作，主要为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主义、后殖民地主义等，不一而足，百花齐放。

新加坡过去被称为文化沙漠，但是现在却朝气蓬勃地向多元文化迈进。本地的作家一路走来就由多元族群组成，作品也以多种语言书写（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这次的新加坡文学神州之行，将特别展现历史悠久的以华文书写的文学，还有其他语文的文学。它将以多种族群作家，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学形式，多种语言的声音，多媒体的形式，多种不同文化的场所来展现其特点。

这次共有十一位老中青作家代表新加坡前往北京与上海，他们是：王润华教授、黄孟文博士、蔡志礼博士、淡莹、唐

爱文教授（印度族）、函函、依沙·卡马里（马来族）、林得楠、希尼尔、英培安、尤今。

2007年8月

撰写新马华文 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在过去，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合为一体，统称为“马华文学”，因而在撰写文学史时，所碰到难题较少。自从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以后，两地的文学由于政治关系而被强行分开，撰写新华文学史或者马华文学史在某些方面就显得错综复杂了。

近几年来，笔者与一批海外学者合作共同撰写一部新华文学史，因此在这方面略有经验。撰写过程是又甘又苦的。笔者的经验仅局限于新华文学。至于马华文学，那是不敢轻举妄动，它需由马华文学专家来处理；虽然笔者原本出生于马来西亚，对1965年以前的马华文学也不无涉猎。（今日的马华文学那是今非昔比，不敢妄自置评。）

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虽然是新华文学，但是不能不触及马华文学。两地文史学者面对的难题，有许多是相同的。希望本文的论点不至于太过离题。

为了研讨方面的方便，且让笔者新华文学的社会背景与发展经过先简略地叙述一下。在这方面，新华文学与马华文学（尤其是1965年以前的文学）是类似甚至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当笔者在谈论新华文学时，其中有些论点也适用于马华文学。

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早在1917年就开始了，本地的新华文学则滥觞于1919年——刚好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有些人不明白何以本地的新文学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这么快就产生，认为很难理解（因为当时两地的信息流通并不如今日那样快速）。其实中国新文学运动于

1917-1918年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以及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就已经发生了，马华文学（包括新华文学）的产生实际上已经是迟了两年。

在1919年以前，在本地出现的一些“创作”，几乎全是用文言文书写的时事评论文章、记事小品、旧诗词、宴饮酬酢之作等，都是象牙塔内的作品，没有多少文学趣味。当时人写的一些介绍南洋风光的游记文章，也绝大部分以中国的读者为主，难以列入本地华文文学的范畴。

众所周知，早期迁移到新加坡的华人，大都是为了要逃避中国的苦难日子，打算在这里寻求一个较为美好的生活。这些人一般上知识水平不高，没有什么文学创作可言。后来有一些较有文化修养的华人南来了，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些评论文章或者闲适小品，发思古之幽情。由于受到中国新文化思想的激荡，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创作，作品中也逐渐参入新思潮。唯一没有多大改变的是，他们的作品仍然没有什么本地色彩，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没有多大创新，一切仍然是唯中国之马首是瞻。

从1919年开始的首十年，新华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乏善可陈。那个时候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强调内容与社会现实，艺术技巧差强人意。文字的运用，语言的掌握，都处于相当粗浅的阶段。一般的作品如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和周丕承的《船中一夜》等，仍相当粗糙。

1920年代末，好多位编者作家提倡“南洋色彩”，并且以这种色彩作为号召。新加坡出版的《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辑张金燕，就是非常特出的一位。他的《悲其遇》和其他的小说，充满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热带情调，文章描写了棕油树、槟榔树、回教堂、印度庙等本地风物。张金燕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作家。在当时，他的“南洋色彩”号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反响。

差不多同个时期，曾圣提、曾华丁、曾玉羊兄弟，以及吴仲青、陈炼青等人把新华文学推向一个高潮。他们不只发表言论以提倡南洋文艺，而且身体力行，写出甚为优秀的作品来。曾圣提的《生与罪》、曾华丁的《五兄弟墓》、曾玉羊的《幽会》、吴仲青的《梯形》等小说，甚博好评。杨松年对曾玉羊甚为推崇，他认为“玉羊的文句简练，词采丰富，亦敢于描绘男女情爱，细腻地写出人物的心理……玉羊的散文与小说，丰富了早期新马华文文学的创作，也给我们留下不少令人可以回味的文章。”^[1]在这几位作家之中，曾圣提对南洋文艺的提倡，最为有力。他在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周刊》的创刊号上发表《文艺周刊的志愿》一文，誓愿“以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他说：“这个刊物无特别使命，它只不过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它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云石之宫，但它却情愿招募它的同情者，同时（在）高椰蕉树之下，以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2]

虽然当时的作家们提倡南洋文艺，但是他们大都把自己当作华侨，中国称为“祖国”，把回中国称为“回故乡”。

到了193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不满足于把本地文艺称为“南洋文艺”，他们更进一步地直呼本地创作为“马来亚文艺”。当时，最有远见的是从中国南来的作家丘士珍。他于1934年以废名为笔名，在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声》发表了一篇《地方作家谈》，首先提倡“马来亚文艺”：

关于马来亚有无文艺，这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地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与马来亚的作

家们所产生的文艺！因为我想，我们应该抓紧“地方作家”这个含义来承认马来亚的文艺，同时要坚决反对以上海才有文艺的错误的高调。^[3]

支持“马来亚文艺”的还有曾艾狄、姚寄鸿（一礁）等。

可惜，丘士珍所提倡的“马来亚文艺”呼声，是相当微弱的。因为当时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本地作家，但是整个新华文坛仍然为南来的中国作家所垄断。^[4]不过，在南来的中国作家中，也有眼光远大，赞成本地地方色彩的，例如郁达夫就主张这儿的文艺作品“应该有极强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显的社会投影。”^[5]

1937年，中国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入中国。整个新马地区抗日情绪高涨，抗战文学油然而生。当时的抗日戏剧活动尤其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他的文学创作领域也非常活跃，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铁抗的小说《白蚁》，就十分突出，该文把当时一些伪抗日者描绘得有声有色，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1942-194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本地丝毫没有文艺可言，文坛是一片空白。抗战胜利以后，作家才从寒地里冒出头来，蠢蠢欲动。那时候的马来亚意识虽然相当普遍，但是原来那批南来的中国作家们，仍然歧视本地作家。他们一心向往中国，视马华文艺为附庸，认为它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相反地，一大批本地的作家已经越来越成熟，作品也越来越有深度。他们大都以本地人的思想与感情来创作。这两批对马华文艺的路线持相反意见的作家，终于在1947-1948年之间爆发了一场“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的激烈论争，中国的胡愈之、金丁、郭沫若和夏衍，本土的周容、西樵（赵

戎）、闻人俊（苗秀）等，也参加了这场论争。^[6]当时本地作家由于客观环境的转变，有需要在本地扎根，故而特别强调马华文艺，认为文艺必须反映此时此地，并且具有马来亚的地方色彩。在这场论争中，“侨民文艺”派虽然声势浩大，但是，“马华文艺”派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仗着天时与地利，就事论事，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奏起凯歌。

不久之后，为了打击马共，马来亚实施了紧急法令，^[7]一些南来的作家如胡愈之等先后回归中国。紧接着中国大陆易手，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地与中国大陆隔绝，不相往来。文学益发本土化，“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口号，自然也就更易于为新马文艺界所接受了。

1950、60年代文风极盛，杏影、苗秀、姚紫等先后发表优秀的著作，再度把新华文学推向高潮。这三位作家走的大体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路线，他们的散文或小说多少反映了1940-60年代的现实，也塑造了一些活生生的人物，深深受到读者的赞赏。苏菲说姚紫既有中国古典文学根茂，又具有西方古典文学的修养，“能够从吸取艺术营养，使他的创作在新马华文作家作品中崭然屹立，具有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8]

至于诗歌方面，周粲、杜红等诗人也各自具有自己的风格。杨义认为新加坡诗坛上有“周粲体”^[9]；陈雪风对于杜红的诗歌《悲剧》则认为：“这是一首饱和了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好诗。同样的，它也是一首具有高度艺术性和完美性的好诗。”^[10]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全国人民在震撼之余，跟随着政治领袖寻求新加坡未来应走之路，文学陷于低潮。1970年，孟毅（黄孟文）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出版，首次使用“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新华文

学”）的名称，两年后，由新社编撰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面世，“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于是以两个不同的形体，平行发展，各自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里，寻找自己的文学空间。

新加坡独立以后，当然还有不少中国南来的作家住在新加坡（居住在马来西亚者自然不少，这儿姑且不谈），他们有人依然情系中国，但是由于政治气候有了转变，他们大都决定从此定居新加坡，为新加坡的文坛效劳。至于在新加坡出生的作家（或者是出生于马来西亚或其他地区而长久居留于新加坡者），那是越来越多。他们的作品，不仅植根于狮岛，而且充满新加坡意识，对自己的国家具有了浓烈的感情。

而且，中国自1949年成立新政体以后，新加坡政府实施了更为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禁止中国五十三家出版社的书刊进入新加坡。那时，新、中两地不仅在政治上南辕北辙，就是在文化上也几乎中止了交流。新加坡人转向台湾、香港和西方世界寻求精神食量，加以新加坡独立后教育制度改体，以英文为主要语言，新加坡人更易于向西方文学思潮汲取营养。尤其是1960、70年代中国那十年文化革命期间，新、中文化交流更加是完全断绝了。不过，虽然在政治上是这样，可是在文化上却不尽然。由于历史渊源长久的缘故，新加坡的华文知识分子与中华文化，始终保有一种千丝万缕的情意结。（时至今日，他们这种“中国文化”上的情意结仍然无法完全消除。）

其实早在1950年代末期，西方文学思想就已经被积极地引进新加坡华文文学界。那时台资出版的《学生周报》和《蕉风月刊》大量推荐台湾的现代诗，打算在新加坡掀起一股强烈的文学改革之风；但是相反地，据说由于不能在本地引起多大反响，这二份刊物很快就转移到吉隆坡去。